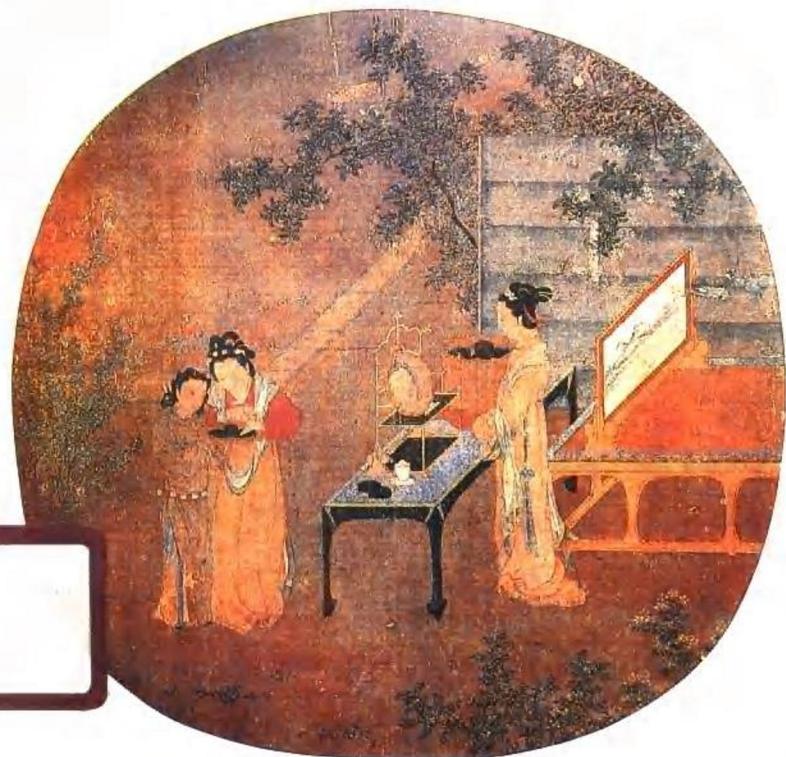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初唐诗歌赏析

赵建利 编著



7.22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初唐诗歌赏析

赵建莉 选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5,875印张 117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200册

ISBN 7—5435—1006—5/I·98 定价: 2.25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序

秦 红

两年多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一部《古典文学选析丛书》，委托梁超然、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自学干部，从今年起陆续出版，预定三年内出完。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诗经》。稍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发展的。到了汉魏六朝，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也愈来愈多了。散文方面，从先秦的神话、寓言故事、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作家林立的局面。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就是指的文学式样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的“杂文”，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文体的总称。

到了唐代，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而且，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这时候，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平时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的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非说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散文方面，到了宋代，开始产生白话小说。宋、元、明几代，白话小说（称之为话本）一直在发展，并从而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而以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

戏剧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匹比的。从元代到明、清两代，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都是戏剧的观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西欧，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这个现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以看见，我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诗歌、话本小说、戏剧，都是先从民间产生，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

编辑出版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沿着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脉络，把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绍给年青一代的读者。这样，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看到各个时代的一些精品——优秀的文学品作，这不但

对于提高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培养对文学的欣赏情趣是有帮助的，而且，对批判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也将是有帮助的。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每本书在注释方面力求做到准确和详细，难点尤其要讲清楚，不避重就轻。韵文一般不译成白话，但《诗经》比较难懂，因此《诗经选析》的各篇都译成白话。为了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每一本书都采用了“赏析”的体例，我们要求“赏析”写得深入浅出，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写作技巧，能抓住要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并从欣赏的角度谈出一点可供读者参考的意见。赏析的写法同教科书的分析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谈具有特色之处，这样，也就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比较丰富多样的写法了。

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引起青年们对文学的广泛兴趣，并使他们从这套丛书中，得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虽是初步的，然而却是广泛的接触，打下更坚实的语文基础。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

前　　言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鼎盛的黄金时代，而初唐则是唐诗孕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先天元年（712），初唐时期将近百年，先后出现过留有文集的诗人150多位，其中著名的近20人。影响大的有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正式揭开了唐诗革新的序幕。继之而起的是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总结了齐梁以来格律诗的创作经验，写出了完整的五、七言律诗，进一步为律诗奠定了基础。高举诗歌革新旗帜的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为唐诗歌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经过初唐众多诗人的努力，多次的改革，多方面的试验，才迎来了盛中唐诗歌繁荣绚烂的局面。

唐开国之初，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先后出现过“贞观”、“永徽”之治的盛世，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再者是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空前的活跃。这一切都为唐诗的革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却远远地落在后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初唐诗坛上开始仍弥漫着梁陈的余风。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关于这方面概括得很精要：“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

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了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也说过这样的话：初唐诗坛“开始于陈隋遗老的遗响，终止于王、杨、卢、骆四杰的鹰扬。”这里陈隋遗老是指由隋入唐的诗人，如陈叔达、虞世南、欧阳询、李百药、杜之松、许敬宗、褚亮、蔡允恭、杨师道等。此外，还有长孙无忌、李义府、上官仪、魏徵、王绩等。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写过一些好诗，如魏徵的《述怀》，气概雄健，颇负盛名。李百药的《咏蝉》，虞世南的《蝉》亦善得比兴之旨。与众不同的王绩，追踪陶渊明，诗风淡远疏野。如《田家》、《野望》等等，已尽脱绮靡之气。当时王绩、崔信明、陈子良、王梵志等，虽然各以朴实通俗的语言写了一些田园山水诗，或绘景或抒怀，淡远清新。可惜这样的诗不多。泛滥诗坛的却是宫体诗。典型的宫廷诗人上官仪的诗，绮错婉媚，被称作“上官体”。其内容空洞苍白无力，绮靡纤弱不下于梁陈。然而时人竟多相仿效，风靡贞观诗坛。魏徵曾批评说：“竟采浮艳之词，争驰迁诞之说。”（《群书治要序》）诗坛的形势已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地步了，要改变诗风，不是一两人的批评或谏阻所能奏效的。诗歌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上官仪的诗体虽是初唐诗歌的一股逆流，但他把齐、梁以来的对仗手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之程式，对于唐代律诗的形成，作了形式上的准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高宗龙朔（661）至麟德（664）年间，才华艳发、地位卑下而富有革新精神的“四杰”相继登上了诗坛。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见闻一多著《唐诗杂论》）他们不平凡的身世、坎坷的生活经历、渊博的学识以及特殊的性格等，决定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独特道路。他们地位低，接近下层，较了解现实生活。他们的诗歌题材范围相当广阔，内容比较丰富，所表现思想感情也较真实和接近人民，不仅与宫廷生活的“上官体”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他们还明确地提出反对“上官体”。

率先起来向“上官体”发难的是王勃。咸亨三年（672），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建议改革文风：“自微言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酣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经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这里指出文风问题自屈宋时已开始萌发，到了六朝时便越来越严重，坏的文风影响到国之安危。呼吁改革当时绮靡纤弱文风之必要。主张提倡“潜夫”“昌言”式质朴的文风。

王勃的主张得到中书令薛元超的支持，志同道合者积极响应和参与，遂使诗坛风气为之改变。“一朝清廓”、“反诸宏博”（见杨炯的《王子安集序》，以下同），虽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中也可体会和估量出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所谓“知音”、“知己”，当然包括杨炯自己以及卢照邻、骆宾王等人在内。他们都是“思革其弊”，“用

光志业”的积极参与者。卢照邻主张“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辞为贵。”（《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他自然是与王勃志同道合的。由此看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站在同一战线反对时人争相效仿的“上官体”，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

“四杰”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一方面是发展了七言歌行，另一方面是使五言律诗逐渐成熟并趋于定型，且开始了试作七言绝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震动了当时的诗坛；骆宾王的《帝京篇》也被称为当时的绝唱；王勃的《采莲曲》言辞华美，音节浏亮，备受时人的赞赏。七言歌行是从六朝后期的小赋变化出来的，在唐以前多为短篇，如《白猿歌》、《燕歌行》、《捣衣曲》等，到了“四杰”手里得到改造才有新的发展。这种长篇歌行形式非常灵活，抒情间以叙事，七言中杂以两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甚至于八、九、十言。它吸收了六朝乐府中辘轳转式的结构形式以及近体诗的格律，音韵铿锵，节奏和谐，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正如《葚原诗说》里所说的：“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

《长安古意》、《帝京篇》、《采莲曲》等长篇歌行，不仅形式有所创新，内容上也有所突破。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触及了某些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前两篇都是以帝京长安的生活作为题材的，描写了长安繁华热闹的景象，揭露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腐朽以及内部互相倾轧的残酷等等。闻一多先生从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高度赞扬《长安古意》：“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转变。”他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中指出，诗里所表现出的真实感情与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有着起死回生的力量。认为

卢照邻走出一条以宫体诗救宫体诗的成功道路。

至于“四杰”的五言律诗，脍炙人口的名作不少。这些诗歌或咏物，或写景，或抒情，或写边塞军旅生活，形式活泼，风格也较清新刚健。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别薛华》等，被誉为：“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胡应麟《诗薮》）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等，也都是属对工整，音韵铿锵，气格豪放的五言律诗。卢照邻、骆宾王虽擅长五七言长篇歌行，而五言律诗也有成功之作品，如《战城南》、《在狱咏蝉》等。五言律诗，经过“四杰”的大力实践，语言上的精工提炼，促使其渐趋成熟和定型。“四杰”在这方面的功劳，诗歌史上是有定评的。如王世贞所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因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成律家正始。”

此外，他们还写了不少五、七言绝句，如王勃的《春游》、《山中》、《蜀中九日》；卢照邻的《曲池荷》、《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等，也都是唐人绝句中的精华。尤其是七言绝句，王勃与卢照邻有首创之功。

“四杰”虽然竭力反对“上官体”，但他们所创制的“王杨卢骆当时体”也未尽脱六朝余习。正如胡应麟所评说的：

“唐起梁陈，陈衰运后，诗文纤弱委靡，体日益下，宾王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补唐书骆侍御传》）“四杰”虽不同陈子昂那样力崇汉魏，以复古提倡革新。但他们在诗歌革新运动的“前导”作用，还是历代诗论家所承认的。前人曾认为“六朝之有唐，四杰之力也”，“唐有四子，而后有陈（子昂）张（九

龄）”这是合乎继承和革新的辩证道理的。沿袭继承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轻视的，更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四杰”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伟大诗人杜甫早就作过肯定：“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他赞扬“四杰”如长江黄河一样万古长流，垂名千秋。杜甫是将“四杰”放在初唐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来评价的，承认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初唐正是由于“四杰”的出现，才揭开了灿烂辉煌的唐诗的序幕。

从中宗嗣圣元年（684）到先天元年（712），将近三十年，是律诗创立兴起的时代，继“四杰”之后的著名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崔湜、崔液、陈子昂、刘希夷等，此外还有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允济、上官婉儿等知名诗人。然而作为律诗的代表作家，则应首推沈佺期、宋之问及杜审言。

《新唐书·文艺·宋之问传》记载：“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指出了沈佺期和宋之问对律诗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初唐诗坛上的重大影响。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在诗歌创作中使六朝以来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制出七言律诗的新体，因此被称为律诗的奠基人。沈佺期、宋之问都是以写应制诗出名的，又被称为宫体诗人。他们经常侍从皇帝游宴，写诗献赋，一些应制诗曾得到中宗和武则天的赞赏，使他们的诗篇也广为流传，诗名大扬。学者宗之，便是自然的事了。

沈佺期、宋之问两位齐名的诗人，确实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他们的诗，风格很相似，创作道路也相仿佛。两人的命运也差不多，先后都被流放到广西，只不过宋之问更悲惨——赐死桂州（今桂林市）。他们前期的作品多写宫廷生活。这类诗歌缺乏真实感情，充满了阿谀逢迎之词。有些诗虽风靡一时，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价值。不过这些诗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生活的奢靡，以及当时经济文化的繁荣情况。他们的一些好诗，多是在流放后离开宫廷时所写的。宋之问两次贬逐岭南，确实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名篇。如《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等，都是成熟的五言律诗。沈佺期的《送乔隋州侃》、《杂诗三首》之三等，也是五言律诗的名篇。他的七言律《古意》，更是为历代诗评家所称道。他们的五、七言绝句，佳篇也不少。他们的排律也各具独创性。后来的著名诗人如王维、韩愈、孟郊、李商隐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之问诗歌的影响。如王维《渭城曲》的名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就是从宋之问在桂州时所写的“江雨朝飞浥细尘”（《和赵员外桂阳桥遇佳人》）点化出来的。

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称“文章四友”。他是四友中诗歌成就最高的一个。他的诗多为律诗，体制齐全，格律精严，所以也被称作律诗的奠基人之一。他仕途坎坷，长期做地方小官，虽两度入京，职位也远在“四友”中其他三人之下，又曾两次被贬，所以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他的诗多为写景、纪行之作，无甚重大社会题材。由于他久沉下僚，远离朝廷，很少有机会参加像沈宋那样的侍从游宴作诗献赋的活动，所以诗名在当时不及沈宋。他是杜甫的祖父，诗风直接影响到杜甫。杜甫也说过：“诗是吾家

事”，对其祖父也是十分推崇的。

纵观我国的诗歌发展史，初唐主要是律诗创立兴起的阶段。也有人说初唐是大规模徵积词藻的时代。唐诗的各种形式都是在这个时期备齐的。不论是五七言律、或五七言绝以及排律等的出现或完善或定型，都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间、杜审言这七位代表诗人密切相关。正是他们终生不懈的努力，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真正的唐诗才开始出现。他们的成就不能光从形式上来理解。他们走着与陈子昂不同的道路，采用着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为迎接盛唐诗歌的到来做了准备工作。他们既因袭六朝又有所创新，从改造宫体诗入手，使诗歌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这乃是一大转变，其功绩是不可泯没的。他们的作品充分反映初唐诗歌的风貌。所以这本小册子选析了以上七位诗人的49篇作品，大多数是他们的名篇或代表作，内容较充实，形式也新颖，是初唐诗歌中之精华部分，以供读者欣赏或借鉴。因这套丛书中已选有陈子昂的诗作，故他的诗未选入本册。

注释部分，力求准确、简明扼要，并着重解决难点或疑点。赏析部分，尽量采用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便于读者全面理解作品，也引用了一些古代诗论家的评语供参考。

本书脱稿后，承蒙广西大学秦似教授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借此谨表谢意。

赵建莉

1987. 夏

目 录

前言	(1)
王勃	(1)
滕王阁	(2)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5)
别薛华	(8)
铜雀妓(其二)	(12)
山中	(15)
咏风	(18)
采莲曲	(20)
杨炯	(26)
从军行	(27)
战城南	(29)
有所思	(31)
途中	(34)
夜送赵纵	(38)
广溪峡	(39)
卢照邻	(44)
长安古意	(45)
咏史四首(其一)	(53)
战城南	(56)
春晚山庄率题二首(其一)	(59)
昭君怨	(61)

曲池荷	(64)
西使兼送孟学士南游	(66)
骆宾王	(70)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	(71)
在狱咏蝉	(85)
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	(89)
夕次蒲类津	(92)
于易水送人	(95)
在军登城楼	(97)
于西京守岁	(100)
沈佺期	(103)
古意	(104)
杂诗三首（其三）	(107)
钓竿篇	(109)
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113)
喜赦	(116)
驩州南亭夜望	(119)
北邙山	(121)
宋之问	(124)
度大庾岭	(125)
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 二无竞题壁概然成咏	(128)
经梧州	(131)
始安秋日	(134)
灵隐寺	(137)
陆浑山庄	(140)
渡汉江	(143)

杜审言	(145)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146)
春日京中有怀	(149)
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	(152)
大酺	(154)
登襄阳城	(158)
渡湘江	(160)
旅寓安南	(163)
经行岚州	(166)

王 勃

王勃（649?—676），字子安，原籍太原祁县，后移居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他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文学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四杰”，名居首位。勃生性敏悟，又受家学熏陶，少时即显露才华，十四岁时写《滕王阁序》，饮誉文坛；十五岁时写《上刘右相书》，条陈国家大事，甚得刘祥道右相的赏识，被誉为神童，并极力表荐。十七岁时应幽素科举，对策及第，授朝散郎。后为沛王府修撰。可是好景不长，诸王在沛王府斗鸡，王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看了大怒，认为是挑拨诸王的关系，便将他赶出沛王府。他是因才受嫉的。时年仅二十岁。上元元年（674），又因匿杀官奴曹达被判死刑，遇大赦免刑，削职为民。勃于官场再次受挫，便立志著述。上元三年（676），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途经南海不幸溺水惊悸而死。他在短短的一生里，著述甚丰，可惜佚失甚多，今存有明人所辑《王子安集》。

在初唐，王勃是率先提出革新文风的问题的。他的文章虽仍是骈四俪六，但词旨宏逸，风格豪迈，为常流所不能及。王勃的诗歌内容比较广泛，风格刚健清新，对改变初唐诗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风气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